

## 液态生活: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解佳<sup>1,\*</sup> 阳棣昌<sup>2</sup> 何轩<sup>1</sup> 许威<sup>3</sup>

(1.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2.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上海 200444;

3.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数字时代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 数字游民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群体。在主流的叙事中, 数字游民从事远程工作, 选择逃离拥挤的城市与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 在风景优美的异乡达成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因而成为令人羡慕的群体。现有研究大多围绕数字游民的概念、工作与生活方式、社群特征等方面展开, 尚未揭示数字游民流动的动力究竟源于何处以及他们究竟试图构建怎样的生活。文章基于对数字游民的访谈, 并参与数字游民的社区, 揭示了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 舒适的地方与自在的节奏是数字游民流动的空间与时间诉求, 策展式流动中的多样体验则是他们践行理想生活的方式。实践着“液态生活”的数字游民摆脱了逼仄的生存空间、打破了机械的时间安排, 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社区。由于主动放弃确定性的生活, 数字游民因而发展出自律、精神提升等自我技术, 并且积极寻求社区的支持, 建立了一种体验主义的物质观。数字游民的生活实践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机械化的抵抗, 旨在重建有机的、平衡的生活节奏。

**关键词:** 数字游民; 流动的现代性; 液态生活; 独异性社会; 不稳定性

DOI:10.16323/j.cnki.lykx.2024.05.003

收稿日期:2022-08-16; 修订日期:2024-04-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媒介地理视角的乡村旅游地‘主客共享空间’建构研究”(4200114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移动性视角下背包旅行者的时空差异及其作用机制”(42071177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流动基础设施作用下劳工移民地方嵌入的过程、机制与效应:粤港澳大湾区案例”(42371239)。

**作者简介:** 解佳(1987—), 女, 博士,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青年旅游者与媒介地理学, E-mail: xiejia0610@163.com。阳棣昌(2000—), 男,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何轩(2000—), 男,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本科生。许威(1999—), 男,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硕士生。

\*通讯作者。

## 0 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游民”一词长期具贬义色彩:先秦法家认为不务农的百姓就是游民;明清时期,游民指的是那些不从事农、工、商者,与地痞流氓类似;近代中国,从事不正当职业如“匪、盗、丐”等的人被称为游民(阮清华,2009)。可见,历史上对游民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处于社会底层、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因其担任的是非生产者的角色,所以需要被“纠正与改造”的一批人(廖胜平,2010)。然而,随着现代性从“固态”向“液态”转变,流动不仅获得合法性,并且越来越成为能力与权力的象征,考夫曼甚至因此发明了“流动力(motility)”的概念(Kaufmann et al.,2004)。鲍曼(2002)将现代社会中的流动人群分为“观光者”和“流浪者”两类,前者是因为发现了世界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而主动移动。毫无疑问,“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是数字时代的“观光者”,他们四海为家,互联网不仅成为他们记录生活、分享经历、寻找同好的平台,也是他们的劳动工具与收入来源。在主流的叙事中,数字游民凭借自身掌握的数字技术,实现了劳动与工作地点的分离。他们可以逃离拥挤的城市与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在风景优美的异乡达成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而成为令人羡慕的群体。

虽然数字游民的概念早在1997年就被提出,但这一群体发展为令人瞩目的全球现象主要在近五年。2023年,全世界约有3500万数字游民,其中七成成为欧美人士,亚洲人士仅占8%<sup>①</sup>。从绝对数量来看,中国的数字游民群体并不庞大,但该人群发展速度迅猛且在年轻群体中收获了大量拥趸。《2021中国度假旅居白皮书》指出,超过六成的中国青年愿意成为数字游民,在00后群体中,该数据比例更是高达78%<sup>②</sup>。国内的数字游民从最初的远程工作者如设计师、程序员、教育工作者等,逐步扩张到以自主创业为主的电商、网络主播、艺术创作者等,近期甚至开始出现从事投资工作的“游民”企业家<sup>③</sup>,数字游民的规模、丰富度、社会影响力等都在不断提升。国内外研究者已开始关注这一新兴群体,围绕概念(Müller,2016;黎巛等,2023)、工作与生活方式(Green,2020;Hannonen,2020)、社群特征(Reichenberger,2018)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然而,正如姚建华等(2023)在梳理现有数字游民的研究后指出,数字游民全球流动的动力究竟源于何处,仍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本文基于对数字游民的访谈,并参与数字游民的社区,旨在揭示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与实践路径,同时结合鲍曼等人对流动和现代性关系的分析,剖析数字社会中人们试图掌握生活主动权的努力与面临的困境。

① TAGLIAFERRI C. 45+ exciting statistics about digital nomads in 2023[EB/OL].(2022-01-24)[2023-11-19].<https://thinkremote.com/digital-nomad-statistics>.

② 马蜂窝.2021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R/OL].(2022-03-10)[2023-11-19].<https://www.mafengwo.cn/gonglve/zt-1025.html>.

③ 博雅方略白墨.数字游民的诗与远方(下)[Z/OL].(2022-09-20)[2023-11-19].<http://www.onpku.com/News/industry/2022/0920/1686.html>.

## 1 文献回顾

目前数字游民的研究主题集中在概念界定、工作与生活融合策略、数字游民社区、数字游民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四个方面。

第一,数字游民的概念界定。1997年,Makimoto和Manners在*Digital Nomad*一书中首次提出“数字游民”的概念,认为技术进步将使得未来劳动者可以借助移动通信与智能技术,将工作从时间和位置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履行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Makimoto et al., 1997)。2021年,社会学家Beverly Yuen Thompson教授在*Digital Nomads Living on the Margins: Remote Laptop Entrepreneurs in the Gig Economy*一书中将“数字游民”界定为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在任何地方都能进行远程工作,并从中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Thompson, 2021)。黎巛等(2023)在梳理了现有数字游民的文献后指出,位置独立性、移动性、工作专注度、工作数字化、工作不稳定性和旅行频率这6个指标是区分数字游民、远程工作者、商务旅行者和打工旅游者的主要依据,数字游民在以上6个指标中均处于较高级别。姚建华等(2023)指出,追求自由、不间断地旅行、旅行途中工作、具有专业化和信息化素养、对目的地文化的侵入与融合是数字游民最重要的5个特征。

第二,数字游民的一大特点即携带“工作”出游,相较于身心两轻的一般旅游者,协调工作与生活心理边界是他们体验这种生活方式的首要阻碍。Cook(2020)研究发现,虽然数字游民的生活充满自由与浪漫气质,但是自律是实现这种自由的先决条件。他们会通过外部导向和自我导向两个方面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前者包括固定的工作时间与截止日期,后者则强调对自我纪律意识的培养,如通过冥想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简而言之,数字游民是一种需要高度纪律和自律的生活方式。

第三,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所要求的工作与生活融合的需求,以及对相对熟悉感的需要引起了研究者对相关物质空间的关注。Orel(2019)的研究发现,数字游民的发展与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密切相关,舒适的办公条件与居住空间是数字游民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基础,并且被视为加强社交与消除孤独感的幸福场所。Chevtava等(2021)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联合办公空间可以培养社区归属感,并且能够促进潜在商业活动的发展。具体而言,数字游民社区的公共空间,既是他们平衡生活与工作的有效工具,也发挥着消除孤独感的情感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还潜藏着经济效益。

第四,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群体,数字游民实践行动的社会后果也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关注。例如:有研究指出,数字游民对新型住宿空间(居住空间和办公空间的交叠)的需求可能导致酒店业基础设施的更新(Orel, 2020)。Mcelroy(2020)则通过对罗马尼亚克鲁日的研究发现,数字游民和技术公司的到来直接侵占了本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并导致了复杂的罗姆人身份认同问题,数字游民背后的技术资本主义霸权逐步显现。一种类士绅化的可能后果随着数字游民的地方流动开始引发人们的担忧。厄里等(2016)曾警示流动性背后的权力不平等问题,即一些人的流

动权利是建立在剥削另一些人流动权利的基础上。因此,作为地方的外来客,数字游民的社群行为及其社区发展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影响机制与后果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国内数字游民主要聚集在云南大理(NCC社区)、四川温江(天星村青创工作站)、海南文昌(Serendipity空间)、浙江安吉(DNA安吉数字游民公社)等地,新的社区仍不断涌现。2022年3月,国内数字游民理念的先行者檀林联合原乡映客发布《数字游民计划》<sup>①</sup>,称团队已联合社会多方力量,将在3年内打造温州泰顺、金华浦江等近十处数字游民社区,吸纳10万+国内数字游民会员,构建规模化的中国数字游民产业,迎接即将到来的“10亿数字游民时代”。

面对不断壮大的群体,国内研究者也积极回应。徐琳岚等(2023)聚焦数字游民地方感的形成,认为数字游民的个体认同机制出现了从“属地认同”向“属人认同”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重塑了人地联结的方式,最终形成“流动地方感”。王喆等(2023)以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为例,探讨了数字游民的社会空间生产实践活动,并借此进一步分析数字游民社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姚建华等(2023)的研究则指出,必须充分认识中西方数字游民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政策环境,以及数字游民工作和生活所依托的平台媒体等层面的,也包括中国特定政策与发展规划所带来的差异。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数字游民的研究主题较为丰富,但研究内容更多是探索性的。相应的经验研究也多停留在对数字游民具体生活方式及心理状态的情景刻画上,缺乏对其相关行为的社会因素探讨,当然这同数字游民本身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本研究基于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试图从多个维度剖析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同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梳理影响数字游民生活实践的因素,从而解释他们在流动中寻求重建的是何种生活。

##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挖掘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和实践路径,因此对受访者个体生活与工作经历的调查最为关键,以归纳逻辑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较为合适。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型生活方式群体,数字游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现活跃,但在现实生活中较难识别。因此,本研究首先采取网络民族志方法,通过各类社交媒体对自我标定数字游民的网络账号进行观察与记录,并在此过程中逐步锚定受访对象,邀约访谈。在第二阶段,项目组成员对国内J市的著名数字游民社区(以下简称“A社区”)进行实地田野调查,以深入了解数字游民社群的实际生活样态。在招募访谈对象的过程中,研究者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对数字游民进行界定。主观方面是受访自我认同为数字游民,客观方面主要是采用上文Thompson(2021)对数字游民的定义,将远程办公、移动与旅行、工作数字化三点作为衡量是否为数字游民的核心标准。

<sup>①</sup> 原乡映客.数字游民计划:打造宜居宜业新乡村[Z/OL].(2022-02-15)[2023-11-19].<https://mp.weixin.qq.com/s/psEGA4XdRgQnQdXcBsrqQ>.

第一阶段: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项目组成员在豆瓣和小红书平台<sup>①</sup>以“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远程工作”为关键词检索与数字游民相关的内容信息。首先通过观察内容发布者的用户信息及其所发布内容与数字游民的相关度,初步筛选潜在受访对象。其次通过持续性的账号观察,包括其发布内容质量、互动活跃度、内容分享频率等信息来确定最终邀约访谈名单。最终得到6位受邀者回应,并通过微信语音完成在线访谈。访谈时间从20分钟到40分钟不等,涉及数字游民在网络上的自我呈现、工作背景、流动轨迹、生活与工作态度等内容。

第二阶段:A社区是国内较早针对数字游民社群搭建的特色社区之一,与西方研究中主流的城市数字游民社区不同,A社区的乡村属性非常明显。该社区自2021年开业以来得到了众多数字游民的青睐,并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中。2023年9月至10月,项目组成员通过入住申请顺利进入A社区开展田野调查。秉持质性研究目的性抽样和“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原则(潘绥铭等,2010),线下访谈与抽样交替进行,并在数据收集期间不断对访谈提纲进行修改。访谈首先以自我认定的方式来确定受访者的数字游民身份,随后的访谈主要涵盖个人生活史、游民生活体验等问题,并进一步包括社交互动、社区生活、未来规划等内容。最终访谈17人,访谈时间从2小时到3小时不等。上述所有访谈都在受访者许可下进行录音,受访者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 3 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

#### 3.1 舒适的地方:流动的空间诉求

在空间上不停流动是数字游民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关键在于找到或创建一个符合个人喜好及技术要求的舒适空间(Nash et al., 2021)。研究发现,工作与旅行交织的、满足一定质量标准的生活体验是数字游民流动的一项基本准则。利用可自由支配的流动能力,数字游民总在追求舒适之物的路上,享受的逻辑贯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享受并不是通过支付高昂的经济成本来实现,数字游民强调战略性地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本获取自我感知舒适的生活环境。W06幽默地描述了她对居住地的筛选标准:

“找一个居住的地方,就跟找男朋友一样,总觉得能找到更合适的,但合不合适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主要跟心态有关,下定决心了,只要基本要求满足,都可以合适。那么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三点:一、良好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二、舒适便利的交通和居住环境;三、多元包容的社区氛围。”

在舒适的逻辑之下,数字游民拒绝冒险与艰苦。A05谈道:“西藏、新疆那种不太行,就是那个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A17直言:“我不接受去过很穷的生活。”A14和男朋友曾在海南文昌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不满意文昌数字游民社区的居住条件,他们选择了在社区外租房居住,“在文昌,我们就觉得那个社区的居住条件太差

<sup>①</sup> 一方面,豆瓣和小红书平台都是以图文为主的社交媒体,相较于视频媒体能够给研究者提供更多可读信息。另一方面,豆瓣是国内小众网络社群聚集地,小红书则是国内各类新潮信息的分享平台,二者对于数字游民的相关讨论信息都较为丰富。

表1 被访数字游民的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情感状况	学历
W01	女	39	自媒体	恋爱	本科
W02	女	33	自主创业	已婚	/
W03	女	20+	自媒体	单身	/
W04	女	26	远程教育	单身	/
W05	女	20+	/	单身	/
W06	女	27	自主创业	单身	本科
A01	男	33	自主创业	恋爱	研究生
A02	男	52	自主创业	已婚	本科
A03	男	28	企业远程	已婚	大专
A04	男	27	/	单身	本科
A05	男	30	企业远程	单身	本科
A06	男	28	企业远程	单身	研究生
A07	男	27	自主创业	单身	本科
A08	女	20+	企业远程	单身	本科
A09	女	25	自主创业	单身	研究生
A10	女	24	自主创业	单身	大专
A11	女	24	自媒体	单身	本科
A12	女	24	企业远程	单身	本科
A13	女	26	企业远程	单身	研究生
A14	女	29	远程教育	恋爱	研究生
A15	女	26	远程教育	单身	本科
A16	女	26	远程教育	单身	本科
A17	女	33	自主创业	单身	本科

注:W代表网络访谈,A代表实地访谈。

了,所以就是我们自己租的房子……但是会去跟社区里的人玩。我就是对这个居住条件有要求……住社区可能还是更有意思一些,人比较多,活动要多一点”。由此可见,数字游民的生活并非一场说走就走的散漫旅行,他们心中存在一条“标准线”。良好的办公环境、起居环境、社交环境是他们选择目的地的核心关切。

许多受访者都表示,居家办公的简陋环境是影响他们开启游民生活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被城市“推出来的”。正如A04所指出的:“家里不太适合办公……就好像还是在办公室,然后就想换个地方。本来我现在对于办公地点来说是相对自由的,可以自己选择去哪儿,我想用上这个优势。”从海外回国自主创业的A07也曾在家中暂居,由于缺乏良好的工作氛围,他很快便来到了A社区。在他看来,“家里的环境是给我爸妈打造的,不太适合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找一个适合工作的环境,同时又有人可以(社交),又有活动”。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A社区的大型公共办公空间一直是宣传的重点。社区还有一个缄默规则,即任何可用的桌椅都可供办公使用。此外,A社区所有公共空间都24小时开放,空调与无线

网络免费供应。距离A社区1.6千米处,还有一个多功能办公区域供数字游民免费使用,其中配备图书馆、会议室、演讲厅等各类优质基础设施。许多数字游民被A社区的卓越办公环境吸引而来。A06表示:“我看到图片上的设施,就觉得它符合我理想中的数字游民居住和办公环境,所以就来了。”

除了通过流动获得一个更舒适的办公环境外,数字游民同样关注生活环境质量。当今城市中,非社区型的共享办公空间已然可以满足远程工作者对工作氛围的需要。但对数字游民而言,由于缺乏起居和社交功能,那里显然无法满足他们对舒适生活的期待。因此,A社区所具有的乡村自然环境也成为这群城市青年津津乐道的部分。A09十分享受在A社区的生活时光,“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我很享受……早上六七点的时候,你走那条路会非常惬意,就是你在城市里面体会不到的那种感觉”。不单单是城乡环境的差别,气候条件也是影响数字游民迁移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流动路线与候鸟旅游者无异。W03向我们分享了她的流动想法,“虽然在成都的这段时间也很难忘,但是这里冬天太冷了,我受不了,所以我最后肯定是要离开这里的”。为符合数字游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A社区在生活设施的配置上远优于当地接待业的平均水平,而影响游民生活舒适度的最大敌人则是当地稍显落后的公共交通和蚊虫。我们发现,在A社区几乎人手配备一瓶花露水,并且在公共空间还能经常看到游民们遗忘的花露水瓶。此外,在城市生活中形成的网购、点外卖等行为也被保留下来,以弥补社区物质条件的不足。

数字游民社区丰富的社交也是空间舒适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挣脱了坐班工作连带的制度性要求,数字游民可以按照自己舒适的状态自主安排生活。原本在企业上班的A17表示:“我以前在公司带团队的时候感觉很焦虑……现在就很放松,妆都没化。”一起做饭、吃饭是社区感形成的重要环节,虽然社区配备游民食堂且可以点外卖,但游民并不满足于此。在社区的共享厨房里,每天都会有人亲自下厨并让其他成员品鉴自己的厨艺,社区的微信群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他们聚餐玩乐的重要工具,不间断地会有外出聚餐的接龙信息。对于新进游民而言,只需参与微信群中公开的各类活动,他们很快就能结识朋友并融入社区。这种丰富的生活体验由社区良好的社交氛围所营造。和A17的叙述一致,在社区生活的游民大多是素颜,他们可能上午十点才起床,踩着拖鞋随意找个空位坐下便开始工作,没有人会对你的仪表评头论足。而在一些由游民自发组织的聚会活动上,大家又可能会精心梳妆打扮一番,化妆与否取决于游民自身的舒适体验。相比于居家办公,丰富的社交活动正是吸引他们走出家、走向流动的重要因素。正如A13向我们分享的,“在数字游民的过程中,我有一段时间也是住家里的,但那时候我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来了游民社区之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放开了,更健康向上”。总而言之,数字游民既不是以纯粹领略风光为主的旅行者,也不是为经济收益而疲于奔波的工作狂,他们更准确的定位是“生活家”。工作和旅行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 3.2 自在的节奏:流动的时间诉求

时间测量工具的发明与进步让人类得以脱离自然界的自然时间,同时发展出其特有的时间结构,并在社会时间标准化工程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催生出一系列

的标准时间(郑作彧,2018)。起初,这些标准时间结构被社会权力机构用以组织和框定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现在这些规范化的时间权力则越来越超脱制度机构的限制而内化于主体的心智之中(黄丹,2022)。由此,个体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最终都受制于资本的时间。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时间并不等同于非自由时间(于天宇,2022),问题的关键在于主体无法自主使用时间或随时间共舞。在这一境况下,个体安排日常生活的时间形式全然参考标准化的时间结构,从而丧失了其改造或调试社会时间结构的自主性(郑作彧,2018)。换言之,一方面,人们必须依照一个既定的外部规范时刻行事,在机构的时间律令中安排生活,个体生活的节奏进而屈从于机构运转的秩序。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事件的发生原本不以任何时间为前提,但在时间结构的标准框架下,事件降格于时间。一切行动都被置于有意图的时间中,人们习惯于在分割的时间从事既定的活动,同时忌惮其他行动的发生。然而,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并不依从以上时间结构与规则,而是代表了一种人们重新获得时间自主性的可能。

许多受访者在成为数字游民之前都有过“朝九晚五”的工作经验,他们的时间被例行事务严格规定,就像A12对她过往生活工作的描述,“每日的日程表、时间表都摆在那边,什么时候起床洗漱然后上班,甚至在几点几分的地铁上”。在这种流水线的生活中,人们的作息节奏由城市的运转秩序来驱动而非作为主体的自己。在A社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异质性的,直至上午10点,整个社区似乎都还处于睡梦之中,但实际上有的游民已经在早晨7点完成了越野晨跑,而有些游民则通宵至凌晨5点。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免去了坐班工作中必要的但无意义的时间,如通勤、化妆、应酬,由此获得了根据自身生活节奏来定制自己时间的机会,恰如A03的感受,“现在我感觉可以对自我生活有很好的掌控感”。在A16的感受中,这种对时间的掌握感还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和谐、自然,不再报复性地消耗非工作时间,“我的作息更自然了。以前如果是周五,或者是周六,自己会觉得不熬一下的话,会对不起这个周末。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概念”。

这种时间的掌控能力也体现为对时间的人为解绑,即容许生活中的偶发事件,使行动自然展开,而不受预先设定事件的时间框限制,从而让时间内在于事件。在日常生活中,A11并不会对自己的时间进行十分刻意的规划。在她的描述中,日子过得有些散漫,但这种散漫不是消极意义的,相反它赋予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以下是她对自己一天生活的回溯:

“中午起床吃个饭,下午开始画画或者说是打一会儿游戏。再吃个晚饭,然后画画或者打游戏,或者说跟别人聊天。到了晚上大概是11点可能会去洗澡,也可能会再滞留一段时间到12点左右,反正就去睡,就回床上准备休息。因为我会让自己的时间比较弹性,就比如说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我是允许它们发生的,因为我没有说太紧迫地想要去达成什么事情,也就欲速则不达……就是我能让自己想睡一觉的时候睡,或者说今天不想工作就不工作。我就是要好好生活,好好生活才能反哺出我的好的创作。”

因为劳动与工作地点的分离,也因为劳动不受程式化时间的制约,数字游民的

生活打破了工作日与休息日、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二分法。在他们的意识中,生活的秩序占据主导地位,不再以时间切割事件而是以不同的行动状态编织生活的。在A社区,出于默认的友好共处秩序,当一个人在工作时,其他人会主动避免打扰他,但是除工作外的其他活动同时在社区各处进行。对个体而言,数字游民允许自己在工作状态内有其他行动的发生。例如:A13会在同其他游民外出按摩的过程中拿起电脑工作,只因为“这种状态下工作起来更轻松”;A16也描述了其远程上课时转换状态的例子,“课间十分钟的时候,我觉得外面听着这歌很热闹,觉得大家玩得很开心,我就一定要去参与,去合影,冒个泡儿再赶紧回来上课……再接下来上课的时候反而会更开心,我觉得我的状态也会更好一点,反而是对工作效率有提升”。数字游民没有严格的时间分配法,是否要从工作状态切换到生活状态,抑或叠加两种状态,这完全取决于当下时刻游民自身的需要。

韩炳哲(2019)认为,在当今社会,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已经构建了一座移动的劳动营,生命进一步被技术压制。在数字游民的案例中,这种生命囚禁并不完全是技术的逻辑,将工作时间世俗化为游戏时间的关键在于主体自身对生活意义的醒悟。数字游民并不一定属于富裕阶层,但他们是知识阶层或技术精英,对应该如何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思想也更开放。经济不是唯一的逻辑,战略性的思想和策略性的技术可以有效抵抗生活的异化。

### 3.3 策展的生活:流动多样体验

在莱克维茨描述的晚现代独异性社会中,旧有的工业劳动体系已经部分转向新兴的创意劳动体系。在这一新的评价体系下,劳动主体的创造性与独特性成了个体与社会共同追捧的珍宝。而那些依然遵从固定劳作模式的专业雇员反倒被贬低为没有灵气的呆板工人(莱克维茨,2019)。诚然,工业社会以来的整个劳动体系不会被全然颠覆,但这种独异性思想的灌注却是社会性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数字游民作为掌握丰厚文化资本的知识阶层,他们在心智层面的反应和转换最为迅速,某种程度上就是莱克维茨叙述中的以实现自我为成功表征的新中产主体(莱克维茨,2019)。A03的例子直观地呈现了这种论述,新冠疫情中断了他的自主创业计划并迫使其回归传统坐班制生活,然而这种工作模式不但没能让他重拾生活的意义,反而驱使他走上数字游民的生活道路。他这样评价这段工作:

“坐班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每天面对的同事这些人,不管是20人,30个人还是多少,我跟这些人基本是没有任何的兴趣去交流。因为他们更多就是一个朝九晚五上班,然后去养家糊口,都是这样的生活状态。这些人在我眼里是没有什么太多活力的。”

许多受访者都有和A03类似的生活经历。他们拒绝既定的生活路径与缺乏创造性的工作模式,而是选择追求异质性的人生脚本。通过在流动的生活中结识不同人生背景和生活样态的人,他们也拓宽了自己的生活参照框架。W05感叹:“见的人越多,越觉得生活有千百种方式,我不能把自己困在朝九晚六里。”

数字游民对异质性生活方式的探索还进一步表现为对多样性生活的资源积累

与拼凑。首先,异质性的可持续在于多样性的补足。莱克维茨(2019)认为,文化不再局限于单一社会群体的再生产,而是转变为可流通或被异质群体选择和占有的资源。数字游民流动性的生活方式意在采摘散落各地的多元文化资源,以此积累自身的独异性资本,从而实现异质性生活的可持续。对A11而言,体验多样性的生活更是直接赋予其艺术创作灵感的关键。其次,异质性的整体呈现依托多样性的拼凑式统一。数字游民的流动没有固定或规律性的时间节点。在询问何时离开A社区时,许多游民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时间计划,“待腻了”或者“找到更想去的地方”是最普遍的回答。因而,数字游民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一种主动策展型策略,通过选取高性价比的目的地丰富自身的视野。对于自媒体工作者来说,这种浪漫化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借由社交媒体提高声望。

数字游民致力于发挥货币的最大购买效用,过高性价比的生活。A01向我们讲述了他的一次购物经验,“那天我们没有什么厚衣服,然后就到镇上去买。正好看到一些小店感觉蛮便宜的,进去看看70块一件,太贵了!我说超过30元的我就不要”。从高消费型资产禁锢中解放,数字游民将更多的花费用于自我提升以及生活质量的增益上。A12认为,数字游民生活的最大优势就是让她能够将金钱花费在自己所期望的地方。A01则表示:“我对物质的需求很小,我更多是想要体验。之所以想买房车也是帮助我更便捷地获得那些体验。”体验取代了占有,成为数字游民生活实践的主导逻辑(Atanasova et al., 2021)。以物质占有为代表的炫耀性消费已经过时,丰富多彩、自由舒适的生活本身成为一种显著的浪漫符号和地位象征,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流动性则是维持这种生活多样性和新鲜感的必要途径。

## 4 数字游民的实践路径

### 4.1 宏观因素:远程工作、地理套利

远程工作构成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基础,为数字游民的生活实践提供了最基本的经济支持和时空机会。在数字社会以前,劳动者个体无法与其所处的时空环境分离,因而劳动者在出售自身劳动力的同时也将他的时间与空间一并售出。当前的坐班制度是劳动力商品化由来已久的产物,资本家在控制劳动力的同时,还对其所拥有的时空资源进行改造并用来强化控制技术,如格子间工位和打卡要求。在此基础上,劳动力被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束缚,甚至还需要劳动者自主交付那些工作之外的时空资源来维系这种控制技术。A09讲述了这种传统劳动生活中的无奈,“就说你每天要通勤很长的上下班时间。你要不断地跑市中心,但很多时候你都是在路上。还有一些人际上的交往,其实也很没必要”。以远程工作为基础的数字游民生活方式则有助于打破这种劳动过程的时空禁锢,让劳动者个体获得自由的工作时间和地点。虽然一些研究认为,资本借用数字技术构建起了一套更精细和隐秘的劳动控制系统(韩文龙等, 2020; 陈龙, 2020),但是数字游民不完全是平台劳动者或永久在线的数字零工,他们不以赚钱为核心目的,生活才是他们的重心。就像A10所说的,“数字游民

应该是工作和生活都能立得很好,他想要的生活过了,工作也做了,但是不会让工作成为生活的全部。不然你何必呢?你上班说不定赚得更多”。正如我们受访者的特征所显示的,数字游民群体相对年轻,没有家庭的负担,因而能够更好地享受劳动的时空解放红利。A13为了继续数字游民生涯,她向所属企业主动降薪以换取远程工作机会。原本从事线下教培行业工作的A15更是因为在线教育的兴起才拥有了成为数字游民的机会。

“地理套利(geographic arbitrage)”是数字游民生活实践中的一项实际措施,简单而言就是“在高收入地区赚钱,去低消费地区生活”(姚建华等,2023),具体表现为货币占有量与货币价值差额两种。利用远程工作的优势,数字游民可以获得一线大城市的工资收入,在货币存量上远超其生活所在地的普通居民,因而可以获得更加优质的生活体验。而利用不同国别间货币汇率的差异,流动生活中的数字游民更是将货币的相对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在数额上而且在价值上,货币都相对增值了。正如A13所指出的,“就算我在上海生活,我拿着新加坡的薪水也是过得比较滋润,更何况我在这儿的乡村”。Hayes(2014)用地理套利的概念来解释从北美(高纬度、高消费)迁移到厄瓜多尔(低纬度、低消费)的生活方式移民和退休移民现象,利用地区发展不平衡,在欠发达地区反而达到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一流动模型同样适用于中国数字游民群体。值得指出的是,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地理套利能够实现的深层原因。

#### 4.2 微观因素:自我技术、社区支持

流动的生活一方面充满自由与惊喜,另一方面也具有风险与不稳定。因此,数字游民采取多种策略来对抗不确定性。其中突出的是观念的转变,从先积累资源再享受消费的延迟满足路径转向“及时行乐”。依靠积累寻求稳定的观念在一些成熟数字游民的眼中也渐成泡影,就像W02所说的,“稳定的生活是没有的,我们一生在波动随机和不确定性中度过。但是,稳定的心境却是真实存在的”。W04也讲述了她思想的变化情况:

“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发现去一个城市所需要的经济开销远远比我想象得要多,所以前期我就会出现一些经济的恐慌。我就觉得没有钱然后可能去不了很多地方。但其实本质不是钱,是内在的匮乏感原因,就其实很多事情虽然需要钱,但钱不是百分百的决定因素。”

在资本影响的主流社会心态下,金钱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人们的自我发展行动让位于经济生产活动,似乎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就永远无法实现自我(王小章等,2023)。然而,一方面,这种观念的产生本就受制于资本;另一方面,期待的足够可能永远都不能足够,个体依旧被牢牢束缚于资源积累型的经济活动上。相较于深陷意义贫困的城市青年(路阳等,2023),数字游民则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自身文化资本实现了对当下社会向上流动的单一价值观的突围,通过掌握轻便资本所附带的流动能力,实现了生活工具性意义和价值性意义的耦合。因而,数字游民的流动生活不仅纾解了他们的时间焦虑感,还进一步重塑了自己的生命节奏,并

将这种时间和生活自主性付诸流动实践。

对抗不确定性的另一种方式是严格自律。已有研究指出,“自律”是数字游民的核心能力之一(Cook, 2020)。尽管数字游民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但是对时间自主性的把握能力才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关键。A14就表示:“我觉得当所有的时间都属于我,相当于完全做我自己时间的主人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自律便体现为对自身时间及行动的有效统筹与执行能力。收入是保障数字游民生活方式可持续的基础。因此,成熟的数字游民往往拥有其个人相对舒适的生活节奏与工作节奏,他们会确保每日工作任务的高效完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遵从特定的作息时间表,灵活的时间安排与高效的时间利用率恰恰是他们时间掌控力的卓越表现。另外,数字游民将许多时间用于健身、冥想、瑜伽、阅读等自我提升的活动上。通过专注于身体和精神的修行,他们也形成了更为坚毅的生活心境。

如果说自律和精神提升是在流动中追求稳定的向内的“自我技术”,那么社区参与就是一种外向的手段。线上与线下社群的建立为数字游民重新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A社区的一位游民在其公众号文章中写道:“数字游民社区就是告诉我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我不是异类。”在A02看来,社区是对数字游民的重要支撑,它将单独的个体游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群体,同时也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人际关系。此外,作为抚慰人类情感的重要行动者,宠物在游民的社区互动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秉持宠物友好空间的运营理念,A社区更促成了良好的人-宠互动氛围。一些游民会将宠物视作家人,陪伴他们旅行,从而缓解在路上的孤寂感。而在社区互动中,这些私人宠物也迅速成为社区“团宠”,为独自旅行或新加入的游民提供陪伴。

在上述关于社区活动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充分展示了线下社区中的社交对数字游民生活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一种自我去稳定的生活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可持续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MBO Partners依据美国社会的调查数据,编制了《2021年数字游民研究简报》,调查发现,46%的人可能在未来几年结束数字游民生涯,大部分人的数字游民生涯不会持续超过3年<sup>①</sup>。区别于西方社会,中国的数字游民群体尚处于起步阶段,他们同时受到集体主义文化和全球化个体主义的影响,因此,有关中国社会数字游民的生活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 5 余论

他们四海为家,没有特定的居所,他们轻盈、灵动、多变,正如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跨境贸易和金融。也是这种贸易和金融造就了他们,支持他们四处游牧……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并实践着“液态生活(liquid life)”的艺术:接受方向的迷失,

<sup>①</sup> MBO Partners.The Digital Nomad Search Continues[R/OL].[2024-01-01].<https://www.mbopartners.com/state-of-independence/2021-digital-nomads-research-brief/>.

免于晕头转向,容忍旅行计划和方向的缺失,以及无限期的旅行。

——鲍曼,2021:90-91

鲍曼(2021)指出,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那些能够流动、主动流动并且在流动中获益的人群是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践着“液态生活”的数字游民摆脱了逼仄的生存空间、跳脱了机械的工作安排,甚至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社区,的确是生活的胜利者。数字游民的生活实践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机械化的抵抗,旨在重建有机的、平衡的生活节奏。

但是鲍曼忽视了大部分数字劳工在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同时,也被不确定性裹挟。面对流动生活所伴随的外部风险,数字游民必须依靠个人的赋能来确保自身安全感,而当个人的心境或者收入发生变化时,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容易受到冲击。因此,就像A11所说的,成为数字游民需要一颗强大的内心,“如果一个心理效能相对低的人选择去做数字游民,或者说是选择一个不确定性较强的生活方式的话,他可能会有很多时间在内耗中。他的收获也会有,但是在那个时刻,他的痛苦也会比较大”。因此,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注定受到诸多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的制约。在宏观层面,他们清晰地意识到社会总体的稳定是实践这种不稳定生活方式的前提。流行病暴发、边境封锁、网络断联、签证政策等都会对数字游民的生活造成干扰,就像W02指出的,“一旦社会秩序失衡,游民就会陷入一种极其被动的局面”。此外,中国的户籍制度及基础设施问题也制约了数字游民家庭的形成。A14表示,在她有了孩子后,流动的生活方式让孩子教育问题难以处理,频繁的流动对幼儿的发展也不利。在微观层面,生命阶段的变化可能影响生活方式的选择。A12直言:“现在才毕业两年,24岁,还处于一个心理状态都不是很安分的这种年纪,所以我没有想着急于安定下来。我想如果我再大个几年,然后有考虑说要在某一个城市定居这种,可能就不会选择像这样到处乱跑的数字游民的生活状态了。”当然,数字游民可以发挥个体能动性以突破某些社会制度的制约。就如A01表示,他想要创造一条全新的教育道路,给数字游民家庭打造“在路上”的学校,给二代游民提供便利。反观西方社会,数字游民家庭已经开始出现<sup>①</sup>,但带着孩子旅行需要支付更多的旅行费用,而且旅行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问题,以及“如何为孩子营造健康的社会化环境”是他们频繁旅行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根据Nyanamba等(2022)的研究,在远程教育活动中,自身需求得到满足的父母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持孩子的学习并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在这方面,贯彻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家长们在应对策略的制定上极具自觉性和创造力。他们利用在线教育(online education)和家庭教育(homeschooling)相结合的模式帮助孩子获得教育,而一些市场机构也借机向他们提供各式短期教育服务项目,如世界学校教育计划(worldschooling)。近期,“数字慢游者(digital slomads)”<sup>②</sup>作为数字游民生活方式

<sup>①</sup> HARDINGHAM-GILL T.They sold everything to become a digital nomad family.Here's what happened next [EB/OL].(2023-12-21)[2024-01-01].<https://edition.cnn.com/travel/sold-everything-digital-nomad-family-kids/index.html>.

<sup>②</sup> slomads是“slow”和“nomad”的组合词。

可持续性的实践反思被提出。一方面,它强调降低旅行频率、减少飞行、投资绿色项目,从宏观层面体现数字游民的生态可持续理念;另一方面,慢旅行也为孩子的生活提供了更稳定的社会交往,同时减少了父母旅途中的照料压力,这在微观层面巩固了数字游民家庭的发展。总而言之,作为一项尚在探索发展的生活方式,数字游民展示了人们对流动生活的追求所带来的无限可能。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虽然作者利用线上访谈和线下田野相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地描绘了数字游民的整体生活样态与流动逻辑,但是A社区自身的独特性可能对研究发现产生影响。后续研究可以利用多点民族志的方式比较不同区域或国别间数字游民社区的异同及其对数字游民生活的影响。其二,本研究尚未深入分析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问题,西方数字游民家庭的出现为我们的进一步讨论奠定了基础。对数字游民的跟踪调查或许可以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生活方式变革带来更多启示。其三,我们发现线下社区互动对数字游民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情感意义,这挑战了鲍曼(2021)对全球旅游者“坚定地拒绝付出,避免承诺”的断言,但缺乏游民的线上互动视角。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索数字游民的线上及线下社群构建,超越社区的商业价值或工具性功能,探讨生活方式型社区中的社会交往,从而回答数字化的流动性社会中能否发展出一种新的关于共同体的想象。其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数字游民群体内部的差异性需要进一步关注。我们调查发现,相较于被企业雇佣的远程工作的数字游民,自雇型的数字游民在风险和压力的感知上也更明显,未来或许可以从数字游民的类型化着手,分析其更深层的异质性流动逻辑。其五,地理套利显然是支撑数字游民生活实践的重要经济条件,囿于访谈深度,我们并未就数字游民的财务来源和处理方式做更多讨论,但有关数字游民的在线跨境劳动及其相关的法律和税务问题同样值得研究。

**致谢:**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举办的“数字游民的理论探索与本土化实践”工作坊,与会专家为本文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宝贵意见。

#### 参考文献:

- 鲍曼,2002.后现代及其缺憾[M]. 郇建立,李静韬,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 鲍曼,2021.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M]. 郭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陈龙,2020.“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J]. 社会学研究(6):113-135;244.
- 厄里,拉森,2016.游客的凝视[M]. 黄宛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韩炳哲,2019.倦怠社会[M]. 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韩文龙,刘璐,2020.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J]. 财经科学(1):67-79.
- 黄丹,2022.竞速游戏:从时间规训到时间管控[J]. 中国青年研究(6):20-28.
- 莱克维茨,2019.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M]. 巩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黎巛,苏婷婷,LI G,等,2023.新型旅行群体——数字游牧民:概念、演化与研究进展[J]. 旅游学刊(1):

122-133.

- 廖胜平, 2010. 北京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3)[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 路阳, 张敦福, 2023. 当代青年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贫困与仪式脱贫——以淄博烧烤为例[J]. 探索与争鸣(8): 109-119; 179.
- 潘绥铭, 姚星亮, 黄盈盈, 2010. 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 是“代表性”还是“代表什么”的问题——“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及其方法论意义[J]. 社会科学研究(4): 108-115.
- 阮清华, 2009. 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年)[D]. 上海: 复旦大学.
- 王小章, 冯婷, 2023. 消费的解放与意义的追寻——作为自我实践的消费如何可能[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129-137.
- 王喆, 邓雅萱, 杜霞琪, 2023. 数字游民的异托邦社会空间生产实践——以浙江安吉 DNA 数字游民公社为例[J]. 未来传播(5): 42-51.
- 徐琳岚, 文春英, 2023. “何以为家”: 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8): 70-79.
- 姚建华, 杨涵庚, 2023. 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J]. 中国青年研究(11): 81-89.
- 于天宇, 2022. 加速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结构批判[J]. 学习与探索(10): 10-17.
- 郑作彧, 2018. 时间形式的时候化: 社会时间形式的改变及其当代现状[J]. 学习与探索(1): 21-36.
- ATANASOVA A, ECKHARDT G M, 2021. The broadening boundaries of materialism [J]. Marketing theory, 21(4): 481-500.
- CHEVTAEVA E, DENIZCI-GUILLET B, 2021. Digital nomads' lifestyles and coworkation [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1: 100633.
- COOK D, 2020. The freedom trap: digital nomads and the use of disciplining practices to manage work/leisure boundaries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2(3): 355-390.
- GREEN P, 2020. Disruptions of self, place and mobility: digital nomads in Chiang Mai, Thailand [J]. Mobilities, 15(3): 431-445.
- HANNONEN O, 2020. In search of a digital nomad: defining the phenomenon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2(3): 335-353.
- HAYES M, 2014. 'We gained a lot over what we would have had': the geographic arbitrage of north American lifestyle migrants to Cuenca, Ecuador [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0(12): 1953-1971.
- KAUFMANN V, BERGMAN M M, JOYE D, 2004. Motility: mobility as capita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8(4): 745-756.
- MAKIMOTO T, MANNERS D, 1997. Digital nomad [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MCELROY E, 2020. Digital nomads in siliconising Cluj: material and allegorical double dispossession [J]. Urban studies, 57(15): 3078-3094.
- MÜLLER A, 2016. The digital nomad: buzzword or research category? [J].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 6(3): 344-348.
- NASH C, JARRAHI M H, SUTHERLAND W, 2021. Nomadic work and location independence: the role of space in shaping the work of digital nomads [J]. Human behavior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3(2): 271-282.

- NYANAMBA J M, LIEW J, LI D, 2022. Parental burnout and remote learning at ho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arents' motivations for involvement[J]. *School psychology*, 37(2): 160-172.
- OREL M, 2019. Coworking environments and digital nomadism: balancing work and leisure whilst on the move[J]. *World leisure journal*, 61(3): 215-227.
- OREL M, 2020. Life is better in flip flops. digital nomad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al travels to Thailan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15(1): 3-9.
- REICHENBERGER I, 2018. Digital nomads—a quest for holistic freedom in work and leisure[J]. *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 21(3): 364-380.
- THOMPSON B Y, 2021. Digital nomads living on the margins: remote-working laptop entrepreneurs in the gig economy[M]. Bingley, UK: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 Liquid Life: The Logic of Mobility and Life Strategies of Digital Nomads

XIE Jia<sup>1\*</sup>, YANG Yanchang<sup>2</sup>, HE Xuan<sup>1</sup>, XU Wei<sup>3</sup>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3.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society, people's lifestyles have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nomads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globally. It seems that the digital nomads are an enviable group for working remotely, choosing to escape crowded cities and nine-to-five jobs, and striking a work-life balance in pleasant places. Most of the exta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ncept, work-life balance, and community life of digital nomads, but it has not yet revealed the motivation of digital nomads and what kind of life they are seeking.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is study focused on digital nomads' logic of mobility and life strateg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pleasant places and comfortable rhythms were the core demands of digital nomads regarding space and time. It also found that they liked diverse experiences, which made their life meaningful. Digital nomads living the "liquid life" get rid of the crowded city, break the mechanical arrangement of life, and build their own unique community. By abandoning the ordinary way of life, digital nomads have developed self-discipline and spiritual enhancement techniques, and actively sought the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The life practices of digital nomads are essentially resistant to the mechanical arrangement of life, aiming to re-establish a balanced rhythm of life.

**Key words:** digital nomads; liquid modernity; liquid life; society of singularities; precariousness